



欧洲梦 21 世纪人类发展的新梦想

BY JEREMY RIFKIN [美]杰里米·里夫金 著 杨治宜 译

THE EUROPEAN DREAM

欧洲梦 21 世纪人类发展的新梦想

BY JEREMY RIFKIN [美]杰里米·里夫金 著 杨治宜 译

THE EUROPEAN DREAM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Copyright © 2004 by Jeremy Rifkin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05 by Chong Qing Publishing House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Jeremy P.Tarcher, a member of penguin Group(USA)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 (2005) 第 95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欧洲梦 / [美]杰里米·里夫金 著; 杨治宜 译.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6.9

书名原文: The European Dream

ISBN 7-5366-8019-8

I. 欧… II. ①杰…②杨… III. 社会意识形态研究 - 欧洲
IV. D09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93232号

欧洲梦

OU ZHOU MENG

[美]杰里米·里夫金 著

杨治宜 译

出 版 人: 罗小卫

策 划: 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 陈建军

特约编辑: 陈 丽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工作室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转810

E-MAIL:sales@alpha-book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23.75 字数: 350千

2006年9月第1版 2006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809955转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致中国读者

杰里米·里夫金

长期以来,中欧之间共享着某种特殊关系。尽管时有争执、常常竞赛、偶尔拌嘴,我们还是可以公平地说,地球这两个地区的人民都向对方的巨大成就表示了相当的倾慕。思想和发明在二者之间自由地流动着,过去五百年间尤为鼎盛。

如今,随着美国梦开始褪色,世界许多其他地区都把目光投向了欧盟和中国,以求汲取 21 世纪的灵感和引导。拥有 25 个成员国、近 5 亿人口的欧盟,挺身成为有史以来首个跨国政治空间。而拥有 13 亿人口和非凡经济增长速度的中国,在全球化世界里不容小觑。在许多方面,这两大政治经济超级强权的命运都会越来越有赖于它们向对方学习、缔结起相互友好之紧密纽带的开放性,这不仅将有助于提高它们的双边利益,也将造福于其他各族人民。

在最基本的商贸层面上,双方都可以从对方的力量中受益。欧盟如今已压倒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实力,并且是全球最大的内部贸易市场。而中国则是全世界发展最快的经济体,拥有巨大的未开发的商业潜力。欧盟和中国携手与共,就能帮助彼此、帮助整个世界,更好地应对联系日益紧密的世界经济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

但是,能够让欧盟和中国找到更深刻的共同基础的,则是在新观念的探索这一更高的层面上,以求在日益相互依赖的世界共同体里休戚与共。尽管它有缺点和不足——而且还相当不少——欧洲依然成了探讨人类前景的最大实验室。新生的欧洲梦强调生活质量、包容性、文化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社会及人权,以及建设全球各民族之间的和平;它乃是有史以来开创“全球化世界里的全球意识”的首次努力。

欧洲梦正在成熟,欧洲人正在付出艰巨的努力,试图使他们的大洲成为第一个全球公共空间,成为全世界各个文化离散体能够协和一致地共同生活、尊重欣

赏彼此独特文化身份之地。对此,越来越多在欧洲访问和工作的中国青年报以了高度关注。

中国同样密切地观察着欧洲的另一项努力,即在强调共同体、团结性的社会模式和强调个人事业机遇的市场模式之间寻找恰当的平衡。在中国,围绕着寻找这两种模式之间恰当点的类似努力也展开了一场激烈辩论。

我的愿望是,《欧洲梦》在中国的出版将促使年轻一代中国人展开广泛对话,商榷他们自己对未来的梦想的形态。我们人类是社会性的动物。当我们寻觅足够的物质福利来保证舒适的生存时,在更深刻的层面上,我们旅途的本质却总是更加形而上学的。当我们老了,回顾平生,我们就会清醒地意识到,那些最重要的时刻却总是和物质成功无关,而是和情感、和与我们的人类同胞、生物同胞、所居处的地球之间的关联感息息相关。正在展露的欧洲梦试图开启一扇大门,通向有关生命意义本身的更重大的问题。作为生存于此世的人类,什么是我们 21 世纪的目的?

为人类寻找新的梦想,欧洲的努力是雄心勃勃的,因此,即便它不能达到目标,也很容易获得谅解。值得思索的一个有趣的问题是,拥有丰富、多样历史的中国人民,能够为欧洲梦的深化、为它成为全人类的真正世界主义梦想,作出怎样的贡献?尽管预言欧洲梦同中国正在苏醒的有关自己对未来之梦想的意识融合,将带来怎样的最终结果还为时过早,但却可能毫不夸张地预言:正在廓清的欧洲思想框架同中国思想框架之间的交融,将会对全人类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探讨世纪之交的人生巨变(代序)

乐黛云

J·里夫金在他的《欧洲梦》一书中,对21世纪有一段精彩的描述。他说:“软件和计算机革命、全球互联网、移动通讯革新、从集中式的化石燃料能源时代向分散式的氢能源时代历史性的过渡、生物技术及接踵而至的纳米技术向人类生活每一个细枝末节的传播,这些都导致了人类看待时间和空间的方式的基本变革。”他认为革命性的新技术迫使我们的时空意识发生了根本变化,人类的关系正在突破旧体制的束缚,自我观念和对世界的感知都迥然不同的新一代正在诞生成长。这一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变动要求我们重新定义人类状况,反思我们需要塑造怎样的世界,需要建立怎样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来应对这一崭新的、影响全球的复杂局面。J·里夫金用“美国梦”和“欧洲梦”两个概念来说明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

“美国梦”和“欧洲梦”并不全是地缘的区别,而是指不同时空中不同的思维方式与生存方式。所谓“美国梦”是指每一个人都拥有不受限制的机遇来追求财富,而较少关注更广阔的人类福祉。在“美国梦”的追求中,私有财产被看做通向个人自由的通行证。一个人拥有的财产越多,就越能具备自主权和流动性,越不依靠或受惠于他人,也越不臣服于环境;财富愈多,个人就愈加独立。财富带来排他性,排他性带来安全,财产是自我和他者之间的边界,个人聚敛巨大财富的成功被当做唯一的或主要的成功标准。“欧洲梦”则不然,它强调生活质量、可持续性、安定与和谐。在J·里夫金看来,“欧洲梦”是一种新的历史观,根据这种历史观,在一个基于“生活质量”而非个人无限聚敛财富的可持续性文明里,以物质为基础的现代发展观本身即将受到修正。所谓“生活质量”就是“实际生活条件”以及“公民个人的主观幸福感”如健康,社会关系,自然环境的质量等。可持续性的全球经济之目标则是:将人类的生产和消费与自然界的的能力联系在一起,通过废品利用和资源的重新补充,不断再

生产出高质量的生活。在这样一个可持续的、保持稳定的经济状态下,重要的并非个人的物质积累,而是自我修养;并非聚敛物质财富,而是精神的提升;并非拓宽疆土,而是拓宽人类的同情(empathy)。从欧洲梦来说,获得自由,意味着能够进入到与他人之间无数种彼此依赖的关系之中。一个人有途径进入越多的共同体,就有越多的选择权,关系带来包容性,包容性带来安全。作为“欧洲梦”两大支柱的文化多元主义和全球生态意识将人性从物质主义的牢笼中解放出来,成就新的人性。

为了进一步探讨以上两种不同的历史状态,以及它所产生的不同的思维方式与生存方式,J·里夫金分析了作为两个阶段经济基础的市场经济和网络经济的不同。他认为在市场经济的范围内,共同利益的提高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来实现;网络经济则是通过每一个人为他人作出贡献、实现更广泛的共同体的利益最大化,从而也提高个人的福利,这就是现在经常提到的“互利、双赢”。推而论之,市场基于对一己私利的追求,网络追求较大范围的共同利益;市场基于不信任,网络基于信任;市场是保持距离的交易,网络则保持较亲密的关系;市场通过和其他人在敌对性的市场框架里竞争以确保财产,网络则是通过归属(belonging)而非通过所有物(belongings)来确保财产,对网络经济来说,最重要的是路径(能进入某些关系)和归属。成功来源于共享的关系,而非孤立奋斗。总之,市场是竞争性的,网络是合作性的。

基于这样的不同,社会政治文化也起了相应的变化。根据J·里夫金的说法,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斗争都是阶级性的,主要围绕着占有、分配资本及保护私人财产权利展开,民权、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都以各自的方式被设计为使财产利益增值,自由被定义为不依靠他人。只要有足够的财产,就可以为所欲为。而在全球化的网络时代,斗争是多元性的,更多地围绕着保存文化身份以及在彼此依靠的世界里获得权利而展开;文化身份建立起将个人从外部世界区分开来的边界,同时又能够用以维护个人进入周边全球洪流的权利,获得自由就意味着更深地陷入与他人之间彼此依赖的关系网之中,这种关系越包容、越深入,一个人就越有可能实现自己的雄心。要想被包容进关系网就需要找到路径,有越多的路径,就越能进入到更多的关系之中,从而也体验着越多的自由。J·里夫金用“美国梦”和“欧洲梦”来概括20世纪末、21世纪初发生的人类生活巨变,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思维方式与生存方式的嬗变,确实很有远见,很能启发思考,虽然他所描述的“美国梦”是一种存在已久的历史状态,“欧洲梦”却仍是一种想象中的或正在发生的历史趋势。

J·里夫金对深深植根于他所热爱的祖国并早已根深蒂固的“美国梦”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批判。他指出,在很大程度上,美国梦深陷于分离和孤立的“死本能”之中。在美国,人们不惜一切代价追求自主,过度消费,纵容每种欲望,浪费地球的丰饶。人们鼓励不受限制的经济增长,强者受奖赏,弱者被边缘化。他们满心要保护自身利益,组建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军事机器,以获取自己想要并相信是分内应得的东西。他们把自己看做是上帝的选民,因此有资格获得一份超出公道份额的地球财富,而他们的自身利益却正在缓慢地蜕变成纯粹的自私自利,以致变成了“死亡文化”。如今,美国人消费了多达三分之一的世界能源,还有数额惊人的其他地球资源,尽管他们的人数只占世界人口总数的不到5%。

J·里夫金还注意到,他所向往的“欧洲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追求有很多相一致的地方。他虽不是研究中国的专家,但从他广博的知识和深邃的思考出发,他看到了这一点。他认为理查德·尼斯贝特在《思想的地理学》(The Geography of Thought)中对亚洲思想的描述让人相信,亚洲民族和国家或许比欧洲人更适合创造网络治理、跨国空间和全球意识。他引用汉学家,也是哲学家亨利·罗斯蒙特(Henry Rosemount)的话说,在儒家思想里,没有“我”能够孤立存在,或被抽象地思考;“我”是根据和其他具体个人的关系而扮演的各种角色的总和;而道家认为整体存在于相反力量之间的关系中,它们共同互相完善。J·里夫金也同意尼斯贝特所说的,对关系的持续关注使亚洲人对感情更加敏感,如果说美国家长用一种“彼我对立”的思维方式,教育孩子从侵占、攫取和财产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那么传统的亚洲家长则更注重感情和社会关系,他们帮助孩子与他人互动,协调自己的行为。同样,J·里夫金认为由于整体化的倾向,亚洲人从来就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如果说西方启蒙主义科学的基础是重塑自然,以符合人类面貌,那么东方的方式则是抛弃人类可以操纵环境的想法,而重在根据环境的需要调整自身。总之,J·里夫金承认中国传统思想更加关注的是和谐、完整和万物的相互影响而非只注意孤立的现象,因而与欧洲梦更为接近。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探讨了中国的现状。他认为为了解决贫穷问题,邓小平把中国现代化梦想重新调整回到物质现代化的方向,提出“发展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战略转变;当贫穷问题初步缓解,问题又集中表现为贫富差距的悬殊,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就促使“和谐社会”概念的提出。J·里夫金认为,从这个20余年来的进程,可以看出中国现代化的梦想,是对西方经验的综合性重新创作,既借鉴了美国式的竞争,又试图借鉴欧洲式的平等,似乎是想把美

国梦的一部分和欧洲梦的一部分综合在一起。他期待拥有悠久历史的中国能为欧洲梦真正发展成为一个全人类的世界梦想带来积极贡献，并断言正在出现的欧洲梦和中国梦无疑会对整个人类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欧洲梦》一书确实是充满智慧和前瞻性。它触及和探讨的问题都是深刻、复杂，十分难以解决的，甚至是充满悖论，但却发人深思的。例如作为“欧洲梦”重要支柱的全球多元文化共存就有许多自相矛盾之处。一方面，世界上每一种重要文化都有其独特的思想体系，都希望获得其普遍性，而不只是一种地方文化；另一方面，J·里夫金又寄望于创造一种“全球化世界的全球意识”，他认为这将是人类意识的下一阶段，是人类的下一个普世梦想，也就是一种“新的元叙述”，这种“新的元叙述”，能够把人类统一到共同的旅途中，同时又允许每个人和团体采取他们自己的特定途径。然而，问题是：这样的“元叙述”将以哪一种思想体系为基础呢？不同的思想体系能抽象出一个共同的“元”吗？更重要的是众多思想体系并存，就有一个如何协调，谁来协调的问题。记得在一次世界哲学大会上，我曾以中国哲学的“和而不同”为题，作了一个发言，谈到晏婴所说的，油盐酱醋必须不同，“相济相成”，才能成其为菜肴。当时，著名的思想家和汉学家本杰明·舒华兹曾提出一个问题，他说：“那么，谁来当厨师，谁来调配这些油盐酱醋呢？”我想，他是提出了一个谁主导，谁当权的问题，这也是今天多元文化共存所必然遇到的问题！事实上，在一种文化中孕育成长起来的人，要进入另一种文化体系，一方面很难完全摒除自己原有的文化色彩（所谓“有色眼镜”），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不受到对方文化的某些不自觉的屏蔽而对其产生盲点。事实上，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确实是人类自有历史以来就不断引起讨论和纷争的问题，至今更是越演越烈，而且越来越重要，因为它牵涉到不同的各种文化能否得以共存。这个问题今天之迫在眉睫并日益尖锐，更是因为正在引起严重冲突的“移民潮”。

移民的问题是对“欧洲梦”的根本考验。首先是欧洲不能没有移民，研究者们得出结论，欧洲将必须每年招募 100 多万移民，才能相当于欧洲女性平均生育一个以上的孩子。仅仅是德国就必须在未来的 30 年里每年迎来 50 万年轻移民，相当于它的生育率的两倍，才能避免人口数量的巨大滑坡——从它目前的 8,300 万跌到低于 7,000 万。其次是不同文化体系之间人们的通婚提出了更复杂的问题。如果说在 1960 年的德国，只有 1.3% 的新生婴儿有外国父亲或母亲，那么，1994 年，却有 18.4% 的新生婴儿都有外国父亲、母亲或双亲，这种趋势今后还会有增无减。J·里夫

金认为,不同文化的婚姻虽然开启了不同文化间新的沟通渠道,弥合了某些文化鸿沟,但另一方面也加深了德国文化的衰亡感,并导致对外国人更加充满敌意的文化压制和报复。欧洲人发现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处在一个左右为难的位置:要是未来数十年内没有移民洪流涌入,欧洲人将会老化,欧洲的经济计划将会衰亡;但另一方面,移民潮又将威胁,甚至压垮已经十分紧张的政府福利预算和人们自身的文化认同感。J·里夫金也不得不提出以下的问题:倘若移民世代保持的原有文化的独特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不再存在,这些“异族”将如何生存?倘若移民不是靠对其所在国的忠诚和共同的意识形态,他们又靠什么与所在国的人们联合在一起?正在诞生的欧洲梦之成败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当代欧洲人如何处理移民问题,以及他们如何真正实现多元文化共生的梦想。但移民问题能否向人们期待的方向发展却仍然是“未定之天”!

再者,“欧洲梦”的主要精神是“能够进入到与他人之间无数种彼此依赖的关系之中”,是实现更广泛的共同体的利益最大化,是更紧密的合作。然而,J·里夫金不能看不到新的全球化技术压缩了时空,一方面拓宽了人们的联系面,另一方面却使人越来越感到疏离和孤单。如果人们只给他人发电子邮件,却极少彼此接触对方的存在,关系就会越来越虚幻,而真正向他人伸出双手,要求的是真实的在场。J·里夫金寄望于美国新兴的社区生活,他指出在过去40年里,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采取了所谓共同利益发展社区(CIDs)的生活方式。在这些社区里,不仅住宅是私人所有,甚至街道、人行道、市镇广场和公园都是由居住成员所拥有。非居住成员必须在大门口请求许可,才可以在街道上开车、在人行道上行走、在公园里散步,或逛广场上的商店。据J·里夫金的统计,已有超过4700万美国人——占美国人口的近六分之一——现已住进这些私有社区,并且其数目还在急剧增长。到本世纪中叶,CIDs可能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生活安排方式。而中国也正在发展这样的社区。J·里夫金认为,在这样的社区里,与单枪匹马的粗糙的个人主义和对抗行为相比,信任、互惠和合作正成为更加重要的生存价值。但是,是否也应看到这样的社区同时也会带来社区与社区之间,以及富有社区与贫穷百姓之间更深刻的疏离与隔阂呢?

总之,《欧洲梦》一书提出了许多富于前瞻性的深刻问题,正因为是前瞻,而尚未经过事实的检验,许多问题还不是定论,甚至也还不是目前所能提出方案加以解决的。但这本书高瞻远瞩,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和思考方向。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一反过去西方中心主义的常态,J·里夫金在展望未来社会时,始终将中国置于其视野

的重要部位。他认为在许多方面,欧洲和中国都正在并肩作战。例如欧洲正努力在强调安全稳定的社会架构和重视独立企业精神的市场体制两者间寻找平衡;而在这两种体制之间达到平衡也恰恰是中国正在追求的目标,相似的努力也正在成为中国全国范围内热切讨论的话题。他认为贯穿在今天的两大精神潮流就是:一、在一个日益物质化的世界里,寻找某种更高的个人使命的渴望;二、在一个逐渐疏离、冷淡的社会里,寻找某种共同体意识的需求,J·里夫金认为这也是欧洲和中国的有识之士所共同追求的。在他看来,欧洲和中国都梦想着一个崭新的时代,即每个人的权利都获得尊重,文化的差异受到欢迎,每个人都在地球可维持的范围内享受着高质量的生活,而人类能够生活在安定与和谐之中。J·里夫金认为,为了共存于一个日益联系紧密的世界,人类需要不断开发新的理念,在这点上,中国和欧洲会找到更多、更深层的共通之处。现在,随着美国梦在 21 世纪渐渐褪去其昔日的炫目光彩,世界将它的目光投向了欧盟和中国。人们在问:拥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化可能为欧洲梦真正发展成为一个全人类的世界梦想带来什么?在 J·里夫金看来,尽管断言欧洲梦和觉醒中的中国梦的融合结果会是什么,还为时尚早,但预言正在出现的欧洲梦和中国梦会对整个人类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则绝非言过其实!

《欧洲梦》中的一段话无疑会激起每一位读者的深思:“当我们垂垂老矣,回首一生之际,我们会清楚地意识到,生命中重要的时刻是那些与物质积累没有什么关联,却和我们对同胞的热爱,我们作为个体与人类的关联,与我们所居住的星球的关联息息相关的时刻!徐徐展开的欧洲梦正在打开通往一个更加深刻的问题的大门,那就是生命的意义。究竟什么是存在于这个世界,存在于 21 世纪的人类的意义?”

2006 年 7 月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前言

上世纪60年代,我曾经是个激进分子。与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我发现自己被卷入到一场社会剧变之中。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非裔美国人要求坐在公交车前排的权利;在芝加哥,他们高举拳头上街游行,唱着“黑色的力量”。美国男孩被装在裹尸袋里从越南重返故土,开始不过是零星几人,后来竟是大批大批的。大学生呼吁终止美国在东南亚的非正义战争,为此他们在大学行政办公区筑起了街垒,抗议非民主的教育系统——在校方作出影响他们生活的决议时,他们却被剥夺了发出声音、投票表决的权利。

空气里充满了解放的气味。你都能闻到它。年轻人厌倦了核弹空袭演习,冷战,穿灰色法兰绒制服的男人,以及束缚心智、一成不变的美国郊区生活,他们到处都在反叛。言论自由、性解放、摇滚乐、大麻、“和平与爱情”(flower power),它们席卷全国,进入美国每一个城市和小镇。反叛的形式在不断变换,有时候你都很难跟上形势,甚至难以坚持下去。阶级政治让位于文化政治,然后是性别政治,最后是生态政治。墙上贴满了切·格瓦拉(Che Guevara)和休伊·牛顿(Huey Newton)的海报;然后它们被取了下来,换成披头士(the Beatles)和滚石(Rolling Stones)的;然后它们再度被取而代之,贴上从外太空拍摄的地球照片。

老左翼让位给新左翼。历史意识以及关于辩证法、唯物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抽象探讨开始与“治疗学意识”(therapeutic consciousness)失去共鸣。年轻人不再引用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或毛泽东的红宝书,而是开始喜欢分享他们最隐秘的情感,谈论他们人际关系的动力源泉,正如政治变成了集体治疗一样。对政治解放的讨论让位于对个人精神修炼的探索。到70年代初期,一切都在进展——除了溃败的意识形态。新的运动正在兴起并即将声名卓著。妇女运动、环境运动、人权和动物权利运动、

同性恋运动,所有这一切都在发生,并开始吸引公众的注意力。

似乎每个人都在要求获得认可的权利。人们走出壁橱,敞开大门,砸碎藩篱和街垒,涌向麦克风和摄像机——有时候,这场集体肾上腺素冲动的唯一显见目的似乎就是要消除任何可以想见的限制和边界。这是种特殊的疯狂。两股潮流贯穿于这场风暴的中心:其一是在一个被看做日益物质化的世界里,对某种更高个人使命的骚动的渴望;其二是在一个逐渐疏离、冷淡的社会里,寻找某种共同体意识的需求。我们都梦想着一个崭新的时代:彼时每个人的权利都获得尊重,没有人被遗落,文化的差异受到欢迎,每个人都在地球可维持的范围内享受着高质量的生活,而人类能够生活在安定与和谐之中。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抨击“美利坚帝国”,指责它为困扰社会的万恶之源。有些人甚至转向了恐怖主义活动,徒劳地指望着这种制度崩溃。

然而在这一切纷纭之中,归根结底,我认识的每一个年轻的美国激进分子内心深处都相信:倘若有什么根本的变动要发生的话,它们也将是从美利坚开始扩展到世界的其余地区。那是因为,即便是在我们拒绝信仰的最黑暗的日子里,我们也依旧信仰着美国精神——对美国是一块特殊的土地、肩负着特殊使命的不懈信念。尽管我那些参与“运动”的朋友们没有谁会敢于坦白这一点,但我们都保留着独一无二的美国意识,即:只要我们有足够强烈的愿望和决心来进行改变,那么在这个国家里就没有什么目标不能实现。欧洲年轻人的信心远不如我们坚定,他们不相信自己真的能改变点什么。他们参与政治的动力是反抗而非改革。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如今局势已然改变。我们曾经有过的打抱不平、如何济世的情感,大多数都未能在美国生根、结果。不错,我们有相当多的公共利益团体,它们所倡导的每一种观念和事业都可以追根溯源到一两代人之前,在少数族裔居住区及大学校园涌动的渴望里。然而,奇怪的是,正是在欧洲,60年代一辈人的情感升华为生活中勇敢的崭新试验——年轻时候的我们还只是模糊地感知到它的剪影轮廓。

人们可以指出为什么欧洲似乎正在率先进入新时代的许多条原因。但在所有可能的解释里,有一条最为关键,那就是我们所珍爱的美国梦本身——它一度是世界所钦羡的理想,如今却导致美国身陷僵局。美国梦强调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拥有不受限制的机遇来追求成功——此词在美国方言里基本与“经济成功”同义。美国梦过度关注个人的物质获取,而很少注目于更广阔的人类福祉,因此无法适应一个日益风险化、多样化和互相依赖的世界。它是一个陈年旧梦,浸透着早已萎谢的开

拓意识。而当美国精神正在“过去”之中疲倦枯萎之时,一个崭新的欧洲梦却正在诞生。这个梦想更好地适应着人类旅程的下一阶段——它允诺将人性提升为全球意识,以同一个日益彼此关联的全球化社会合拍。

欧洲梦注重群体关系而非个体自治,文化多样性而非同化为一,生活质量而非只是财富积累,可持续发展而非无限制的物质增长,深度游戏(deep play)而非单调的持续劳作,普遍人权及自然界的权利而非只突出财产权,全球合作而非单边主义的霸权实践。

欧洲梦正处在后现代与浮现的全球时代交叉的十字路口,并提供了衔接两个时代之间断层的地带。后现代从未想过要成为一个新的时代,它只不过是现代的黄昏——一个对现代的种种缺陷盖棺论定的时期。倘若60年代一辈人的抗议和试验有双重目的,即打破束缚人类精神的旧边界以及检验崭新现实的话,那么它就以后现代的思考形式为自己找到了思想的同盟。

后现代主义者质问世界何以被禁锢在死亡之歌当中。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原子弹投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欧洲建起纳粹的死亡集中营,古拉格设立羁留营?我们何以最终陷入一个贫富史无前例地两极分化的世界?为什么全世界的女人、有色人种和少数族裔都遭到歧视,或者更糟,受到奴役?为什么我们要毁灭环境、毒化生物圈?为什么某些国家不断欺压其他国家,通过战争、征服和镇压来追逐霸权?人类何以逐渐丧失了与生俱来的深度游戏感,而陷入机器式的单调劳作,甚至将无休止的工作当成了人类存在的定义本身?什么时候、什么缘故,物质主义(materialism)替代了理想主义(idealism),而“消费”一词也从贬义摇身变为褒义^[1]?

后现代主义者将现代性本身视为罪恶之源。他们将世界的诸多不幸归咎于他们认为是现代思想牢不可破的基本假设之上。特别受到指摘的是欧洲启蒙运动及其无限制物质进步的梦想,正如市场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及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受到指责一样。后现代思想家认为,现代性的核心存在着深刻的缺陷。可认识的客观现实、不可逆转的线性进步以及人类的完善性——这些观念被过于教条地理解,存在着历史性的偏见,并且没有纳入对人类生存状况和历史终结的多视角、多观点的思考中。

新一代学者十分警惕统摄性的宏大叙述以及试图创造出人类行为统一化前景的偏执乌托邦幻象。后现代主义者辩论道,通过将人性禁锢在思考世界的“唯一正道”上,现代思想蔑视其他一切观点,并且归根结底不能容忍任何的反对意见。他们

认为，当权者——不论是资本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保守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都不断利用这些元叙述(meta-narrative)来压抑和控制人民。在这些批评家看来，现代思想被利用来证明全世界范围内殖民冒险活动的合法性，它将人民彼此隔离开，使他们处于对统治力量有利的状况之中。

60年代一辈人所反抗的正是这些网罗万象的宏伟蓝图，以及限定人们如何在此世生活、行动的偏执乌托邦观念。后现代主义者为此种反抗提供了理论依据，他们认为观察世界的视角并非只有一种，而是有许多种，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有一种叙述方式。后现代社会学强调多元主义以及对不同观点的宽容，因为正是这些观点构成了人类经验的整体性。后现代主义者所追求的并非唯一的理想王国，而毋宁说是各种文化试验的杂烩，每一种都各具价值。

后现代主义者投身于一场扫荡现代性意识形态基础的斗争中，甚至否认将历史看做救赎传奇的观念。最终，后现代解构运动只留下了现代性的思想碎砾，以及一个众声喧哗的“无政府世界”，其中，每个人的故事都同样具有说服力、同样可靠、同样值得认可。

倘若说后现代主义者夷平了现代性的壁垒，解放了其中的囚徒，那么他们给这些被解放的囚徒也没有留下多少可去之处。我们成了存在主义的流浪者，漫游在一个没有边界的世界上，在绝望的寻觅中，模糊地渴望着某种值得依恋、值得信仰之物。尽管人类精神解除了旧有思想范畴的束缚，我们每个人却被迫因此寻觅自己的道路——在一个混乱无序、分崩离析的世界上。这个世界甚至比我们抛在身后的那个网罗万象的世界更加危险。

后现代思想并没有在我们称为“美国核心”的观念中获得显著的一席之地。它向来在欧洲更具影响力。过半数的美国人是热忱的宗教信徒——信教比例高于任何其他工业化的民族——而他们根本就不买所谓“相对主义世界”的账。美国的宗教信徒依旧相信事物具有恢宏的发展构架，并且每天虔诚地实践着自己的信仰。美国非信徒中的多数人尽管并不相信包罗万象的宗教指涉框架，却基本上相信另一种网罗万象的社会蓝图——将历史视为稳定、不可逆转的物质进步的启蒙观念。不过，在美国也有第三种群体，只是人数较少，主要由激进、反主流文化的60年代一辈人以及他们成年的后辈组成。他们对后现代性感觉要自在得多。在他们看来，组成世界的并非绝对价值和颠扑不破的真理，而是相对价值和变动的选择。总体而言，他们较为容忍其他观点及多元文化视角。

政治分析家将美国人分为红色与蓝色两个文化阵营,前者反映了美国所坚持的保守主义宗教价值观,而后者则更倾向于自由主义和世界主义。民意调查显示,红色人群在地理上集中于美国的东南部、中西部、牧区、落基山脉一带以及西南部,而蓝色人群则更多地集中在美国的东北部、中西部北端及西海岸一带。

尽管民意调查不失为一种分析选民倾向的方便快捷的方法,但它们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多数美国人,不论是红色人群还是蓝色人群,都认可一种浸透着现代性意识形态的美国式生活。甚至对其他视角和观点有较大宽容度的蓝色人群,也倾向于相信人类旅程有一个终极的目标,而此世生活有惟一的正道。

相比之下,欧洲人则更加热衷于批判现代性的基本假设并接受后现代的发展方向。这种意愿很大程度上来自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的破坏,以及他们心头萦绕的幽灵:由于对乌托邦幻象和意识形态的盲目信仰,1945年,整片大陆几成废墟。

可以理解的是,欧洲知识分子会成为反对现代性计划的领军人物。他们急于确认为旧的信条不会再一次将他们带往毁灭之路。对元叙述进行预警式的攻击使他们捍卫文化多元主义,并逐渐走向捍卫普遍人权和自然界权利之途。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文化多元主义在各方面都是现代思想的解毒剂,是以多元视角对抗教条主义的单一指涉框架之途。权利实现计划进一步拓宽了对单一视角的攻击。“普遍人权”及“自然界权利”导致承认每个人的故事都具有同等的价值,而地球本身就值得关怀。但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后现代逻辑开始遭遇它自身的内在矛盾。对普遍人权和自然界权利的认可本身就意味着某种元叙述。“普遍”(Universal,或译“共性”)意为某种每个人都认可并接受的基本的不可或缺之物。不知不觉,后现代主义者为自己掘下了坟墓,因为他们承认至少有这样一种每个人都可能同意的普遍观念,即:每个人的生命都具有同等价值,自然界值得受到尊重和关怀。

欧洲梦便开始于后现代主义力不从心之处。剥笋见髓,欧洲梦乃是一种创造崭新历史构架的努力,这一构架既能将个人从西方意识形态的旧轭下解放出来,同时又能够将人类与一个新的共享的故事相连,这个故事穿着普遍人权和自然界内在权利的霓裳——即我们所谓的全球意识。这是一个带领我们超越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进入全球时代的梦想。简而言之,欧洲梦将创造崭新的历史。

近来在美国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圈内流行着对“历史的终结”问题的讨论。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等人认为,随着苏联的解体,自由市场导向的民主已经获得了胜利,未来也不大可能被其他模式所代替。尽管对历史终结的讨论多少有

点幼稚,但却显示出当代历史学家们的偏见:他们假定历史不过是竞争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之间展开的斗争,争论的对象是资源应当如何被利用、进入生产,资本和财产应当如何被控制、被分配,以及人民应当如何被统治。对某些人来说,强调在民主统治的社会里个人不受束缚地积累财富的美国梦,的确代表了对历史终结的终极表述。

新的欧洲梦是强大的,因为它敢于提出一种崭新的历史观,其所注重的是生活质量、可持续性、安定与和谐。在一个基于生活质量而非只是个人财富无限积累的可持续性文明里,以物质为基础的现代发展观本身即将成为陈年旧物。一个保持在稳定状态的全球经济——这是个激进的提案,不仅因为它挑战了我们习惯利用自然资源的常规方式,还因为它否定了将历史视为不断上升的物质进步曲线的观念本身。可持续性全球经济的目标是:通过将人类的生产和消费与自然界的能力联系在一起,通过废品利用和资源的重新补充,不断再生产出高质量的现状。一个可持续、保持稳定的经济,这的确是被定义为无限物质进步的历史之终结。

倘若说欧洲梦代表了某一种历史的终结,那么它也意味着另一种历史的开端。在欧洲对未来的崭新想像里,重要的并非只是个人的物质积累,而是自我修养的提升。新梦想注重的并非聚敛财富,而是提升人类精神。欧洲梦寻求的是拓宽人类的同情(empathy)¹⁴而非疆土。自从18世纪早期开始,人性便被束缚在了物质主义的囹圄中,而欧洲梦将带领人性走出囹圄,进入以理想主义为动力的崭新未来之光辉中。

这本书所要讲述的就是略显陈旧的美国梦和新浮现的欧洲梦。某种意义上,它代表了首次粗略的判别,当然也具有此类努力所难免的缺陷。

尽管我内心深处依然留恋着美国梦,尤其是依然怀抱着对个人之首要性及其责任与义务的坚定不移的信念,但是,我对未来的希望却将我拉向了强调集体责任感及全球意识的欧洲梦。我在后文中将尝试寻找两种梦想之间可能的协作,以求实现综合二者之长的希望。

但我至少能基本肯定如下这点:羽翼初成的欧洲梦代表了人性对美好明天的最美好的渴望。新一代欧洲人肩负了整个世界的希望。这使得欧洲人民承担了一项极其特殊的使命感,正如两百年前我们建国的祖辈们所感受到的那样——彼时,世界的其余地区都将美利坚视为希望之光。但愿我们的信任不会被辜负。